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四期 ——
（二〇〇四年九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9b）

【读史笔记】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史海钩沉】1967：毛泽东南巡始末	权延赤
【人物春秋】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陈益南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史笔记】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 单世联 •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19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AB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会惹祸。”（熊向晖，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思，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1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

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实有误。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有感而发的。

◇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熊向晖，1999：184）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欢迎仪式的大小一直被认为有特定的涵义。1971年11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交代：“在北京市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熊向晖，1999：355）仪式而外，毛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不但是向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也有国内斗争的一个符号。据斯诺记述：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

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熊向晖，1998：214—215）在此前后，毛确实采取措施为个人崇拜降温，比如1970年12月6就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正像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一样，给个人崇拜降温也还有另一重含义，这就是反对林彪，因为“四个伟大”首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态，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使用符号。从1983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王若水，1998）

◇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熊向晖，1999：354）

毛终生自信，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林彪。《纪要》称他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没有小家子气地加以反驳，而是照单全收，1973年9月23日对外宾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还直接通过评法批儒运动褒扬秦始皇。林彪虽然长期对毛毕恭毕敬，但在对于秦始皇的态度上，却与毛有别。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时，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由此引来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豪言。（李锐，1999B：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己复礼”等儒家学说的条幅，启示了毛批林与批孔结合的念头。

但毛这一次确实过于自信了。“文革”天怨人怒，1968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从“文革”的狂热中觉醒，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拔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动很大。还在毛1971年南巡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然，毛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噼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破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张正隆，2000：336）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

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中国的秦始皇。”（王年一，1988：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信用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有谋害毛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怀疑。这次失策的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熊向晖，1999：347）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害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辩证法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能是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反独断论不一样，简化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没有想到”的胜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熊向晖，1999：345）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熊向晖，1999：347）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熊向晖，1999：233）4月3日报告送给周，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11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熊向晖，1999：233）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用法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很周延。但在具体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

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熊向晖，1999：353）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了就有。

辩证法功能甚多。大跃进期间，云南有不少人劳饿交加，一度出现浮肿病。这本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却认为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李捷、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辩证法，什么坏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间。1975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胡乔木，1993：250）

◇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 and 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

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华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

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熊向晖，1999：287）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晖，1999：290）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1976年2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送给我的。’”（熊向晖，1999：290）诗词文章，毛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陈晋，1997：691）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听《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1975年10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赵士刚，1997：292—293）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杨继绳，1998：92）1976年6月，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杨继绳，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 开放档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1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内容，就是对订正若干重要史书中的错漏。类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据他回忆：“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高，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汇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

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参考文献

- 熊向晖：1999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
李 锐：1998A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8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丁三：2003 《蓝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向前：1987 《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胡乔木：199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丁玲：1989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奎松：1999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张正隆：2000 《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
王若水：1998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
《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1988 《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晋：1997 《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士刚：1997 《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高 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高文谦：2003 《晚年 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权延赤：1993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杨继绳：1998 《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万 毅：1998 《万毅将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秦基伟：1996 《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捷、于道俊主编：1997 《东方巨人毛泽东》（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埃里希·奥尔巴赫：2002 《摹仿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 【史海钩沉】

##### 1967：毛泽东南巡始末

• 权延赤 •

#### ◇ 到武汉保陈再道

1967年7月14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驰去。在这动荡

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三列火车；还调来了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另有四架“米8”飞短途；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这次南巡，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遵照毛泽东吩咐，这次南巡还带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14日晚九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周恩来告诉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热得淌汗，一再提出要去游长江。但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的，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劝毛泽东晚些时候再游长江。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与此相应，“中央文革”那几个人也一口咬定：“陈再道是武汉的谭震林。”当时的谭震林正因所谓“二月逆流”挨批。毛泽东曾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所以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总理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夜，十二点半。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十分活跃，他坐在沙发上吸烟，杨成武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点了王力的名。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就刷了标语。”毛泽东问：“谢、王到造反派去过？”“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到过‘百万雄师’吗？”“今晚去了。”“偏于一方。”杨成武听出了毛泽东的态度。

#### ◇ 王力被抓起事端

7月18日晚上八点。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你们怎么样呀？”毛

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

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不料“百万雄师”的人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 ◇ 欲加之罪的“兵变”

很快，正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每逢夏季他在京时都住在浙江厅，这里凉快。“我要写封信。”林彪一声吩咐，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对他林彪，有好多人的不服气，主要是四方面军的。“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写下了带有判断性质的最重要的话后，又写道，“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

既要影响毛泽东，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林彪思前想后，叫来了戚本禹。“这封信你帮助改改，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就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陈再道未包围梅岭一号，他若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江青去见林彪，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邱会作飞武汉送信。杨成武接到邱会作传来的信后，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拆开信，见是江青的笔迹。“劝我去上海”，毛泽东望着信说。“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周恩来也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

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他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凌晨3点，毛泽东的车队出发了。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最前面，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住进了虹桥宾馆。

#### ◇ 我看当作错误处理

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原来，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直至昨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师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师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词。”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师。”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说完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23日凌晨两点半，杨成武飞到北京，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召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开会。陈再道等人闻令立刻起身飞往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结束“碰头会”，周恩来立刻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外交学院正在那里批斗陈毅。陈毅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出光彩，立起身，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怔住了，只见陈毅挺胸扬首：“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语录只有270页，片刻的惊诧后，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陈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五个小时后，即7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陈毅的笑谈传入毛家湾，叶群给杨成武挂通电话。二十年后，其秘书这样回忆当时情景：叶群通话时非常热情：“杨总长你好吗？林总对你很关心……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知道杨成武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叶群的心境可想而知。杨成武放下电话后，脸色也很沉重。身处在夹缝中，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 ◇ 矛头转向“军内一小撮”

7月25日下午五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林彪登上天安门，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蒯大富始终留心观察林彪。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林彪每次都举手了！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这话曾三次被人听到，另外两次是“九大”之后和九届二中全会上庐山之前。

26日下午三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喝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斗争会开了七个小时，陈再道弯腰七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清冷，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阴沉沉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 ◇ 敲山震虎抓王关戚

8月14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叶群看到这几个字，指使林立果：“你赶紧给江青写封信，说明‘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中央文革”也乱了。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陈伯达说：“《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急了，“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康老，当初研究‘七二〇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老夫子即陈伯达。

8月25日凌晨1点，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纪录交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20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我走了。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26日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周恩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了。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他处理了武汉、温州等地的武斗问题，9月16日开始乘专列巡视杭州、南昌、长沙。9月19日，毛泽东重返武汉，又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9月22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在郑州停留接见河南省领导刘建勋、张树之时，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放一遍，你们都听听。”这是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时的讲话，录音播完时，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终于发话了：“‘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驰回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九百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 根据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

~~~~~

【人物春秋】

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 陈益南 •

(一)

李劫夫是中国大陆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音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炙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那的孩子》等，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那首为几代青少年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也是劫夫——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63岁。

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在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庆祝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彪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己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而到10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来。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轮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的苦头。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但是，后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架

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专案“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又过了近三年，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

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

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但是，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还是在当年4月1日，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则在新闻版上，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

□ 2004年7月5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